

## “斜趋汉津”与赤壁大战

冯道信

不朽巨著《三国演义》，叙述历史百余年，描写战争百余次。著名的赤壁大战，是《演义》中描写最宏伟、铺排最阔、冲突最烈、撼人最深的一次战役。此次大战开役之时，魏、蜀、吴三国虽未正式形成，但鼎足之势已现端倪。尤其是，后来治理魏、蜀、吴的主帅都参与了战事，三方的主要军力都投入了战争。可以说，这是一次名符其实的“三国”大战的典型战例。其三方之斗智斗谋、斗力斗勇等等，都毫无愧色地堪称是真正“三国演义”的一个大高潮。赤壁大战，若以火烧赤壁划个中界，战役越过的大致跨度，从总体上看，当从长阪之役到荆楚连片之间。整个战役的阶段当为：长阪之战、斜趋汉津、刘孙联合、赤壁鏖兵、火烧赤壁、曹走华容、激气周瑜、曹还许都、荆楚连片九段。其中，刘备在当阳长阪改投江陵为斜趋汉津，是曹、刘、孙三方力量战事布局的一个转折点。刘备的这一果决行动，在整个战争中的意义及其对赤壁大战的影响和未来三国态势形成的作用，都是不可低估的。

关于刘备集团斜趋汉津的战事行动，以魏为正统的晋·陈寿的《三国志》和尊刘抑曹的《三国演义》以及后来北宋司马光所著的《资治通鉴》，在叙述和描写上大体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无论从历史上的赤壁大战看，或是从小说中的赤壁大战看，“斜趋汉津”都既是事实的存在，又是不可不书的一章。关于“斜趋汉津”与赤壁大战，历来学者之论，虽多各执一端，或偏于史实，或偏于演义，但有一种观点却是共同的，即：“长阪坡一战之后，刘备已不堪一击了”，“刘备集团斜趋汉津，是狼狈遁逃”、“赤壁大战时刘备已经丧失了战斗能力”云云。真相果是如此么？非也。本文拟结合史实和演义作一下粗浅的双向研究，就斜趋汉津的历史必然性、斜趋汉津在整个赤壁大战中的地位、斜趋汉津对鼎足三分局势的影响等方面，对有关问题进行辩证，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 一、刘备斜趋汉津的历史必然性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进行认识，任何一个合理的历史行动，都有其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做了军师，诸葛亮隆中对问定出了通过三分局面的过渡而由刘备统一中国的决策。应当说，由三分到统一，乃是合乎规律的历史性揭示。诸葛亮出草庐之后，即投入了面对强敌曹操的战事。火烧博望坡、火烧新野等战，都只是诸葛亮用兵的战术性演习。而当刘琮襄阳降曹、刘备在曹操精兵追迫下本欲趋投江陵、然而在长阪激战只有数十骑相随的时候，改为斜取汉津从汉水下行投江夏、夏口，却是以诸葛亮为主谋划、由鲁肃促成的具有战略意义的行动了。那末，这个战略行动的历史必然性何在呢？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须首先考察一下刘备斜趋汉津的过程。

在《三国演义》中，刘备斜趋汉津的具体描写在第四十二回“张翼德大闹长阪桥，刘豫州败走汉津口”。对这一过程，书中是这样描写的：

且说张飞见曹军一拥而退，不敢追赶，速唤回原随二十余骑，解去马尾树枝，令将桥梁折断，然后回马来见玄德，具言断桥一事。玄德曰：“吾弟勇则勇矣，惜失于计较。”飞问其故。玄德曰：“曹操多谋。汝不合折断桥梁，彼必追至矣。”飞曰：“他被我一喝，倒退数里，何敢再追？”玄德曰：“若不断桥，彼恐有埋伏，不敢进兵，今折断了桥，彼料我无军而怯，必来追赶。彼有百万之众，虽涉江汉，可填而过，岂惧一桥之断耶？”于是即刻起身，从小路斜投汉津，望沔阳路而走。

却说曹操使张辽、许褚探听长阪桥消息，回报曰：“张飞已折断桥梁而去矣。”操曰：“彼断桥而去，乃心怯也。”遂传令差一万军，速搭三座浮桥，只今夜就要过。李典曰：“此恐是诸葛亮之诈谋，不可轻进。”操曰：“张飞一勇之夫，岂有诈谋！”遂传下号令，火速进兵。

却说玄德行近汉津，忽见后面尘土大起，鼓声连天，喊声震地。玄德曰：“前有大江，后有追兵，如之奈何？”急命赵云准备抵敌。曹操下令军中曰：“今刘备釜中之鱼，阱中之虎，若不就此时擒捉，如放鱼归海，纵虎归山矣。众将可努力向前。”众将领命，一个个奋威追赶。忽山坡后鼓声响处，一队军马飞出，大叫曰：“我在此等候多时了！”当头那员大将，手执青龙刀，坐下赤兔马。原来是关云长，去江夏借得军马一万，探知当阳长阪大战，特地从此路截出。曹操一见云长，即勒住马回顾众将曰：“又中诸葛亮之计也！”传令大军速退。

云长追赶数十里，即回军保护玄德等到汉津，已有船只伺候，云长请玄德并甘夫人、阿斗至船中坐定。云长问曰：“二嫂嫂如何不见？”玄德诉说当阳之事。云长叹曰：“曩日猎于许田时，若从吾意，可无今日之患。”玄德曰：“我于此时亦‘投鼠忌器’耳。”正说之间，忽见江南岸战鼓大鸣，舰船如蚁，顺风扬帆而来。玄德大惊。船来至近，只见一人白袍银铠，立于船头上大呼曰：“叔父别来无恙！小侄得罪。”玄德视之，乃刘琦也。琦过船头拜曰：“闻叔父困于曹操，小侄特来接应。”玄德大喜，遂合兵一处，放舟而行。在船中正诉情由，江西南上战船一字儿摆开，乘风呼哨而至。刘琦惊曰：“江夏之兵，小侄已尽起至此矣。今有战船拦路，非曹操之军，即江东之军也，如之奈何？”玄德出船头视之，见一人纶巾道服，坐在船头上，乃孔明也，背后立着孙乾。玄德慌请过船，问其何故却在此。孔明曰：“亮自至江夏，先令云长于汉津登陆地而接。我料曹操必来追赶，主公必不从江陵来，必斜取汉津矣，故特请公子来接应，我竟往夏口，尽起军前来相助。”玄德大悦，合为一处，商议破曹之策。……

书中所描写的内容，有四个层次：第一层，曹操以精兵追杀刘备，刘备当阳长阪战败，张飞有勇无谋而断了长阪桥，刘备在紧急中立改直奔江陵的行军路线，几十骑人马斜抄小路趋投汉津，从汉水取道转移；第二层，曹操当阳架桥渡河，紧追刘备到汉津；第三层，刘备与关羽汉津会师，汉津口外山坡关羽出奇兵拦击曹操，曹操以为又中了诸葛亮之计，而匆匆回军，关羽还追杀了十几里路；第四层，刘备汉津口上船，于汉水中顺流而下，喜遇刘琦、诸葛亮。第四层中又有三迭：第一迭，关羽回忆许田行猎，一缓；第二迭，江中喜遇刘琦，一惊一喜；第三迭，“江西南上战船一字儿摆开”，大惊，待一细看，船头上端坐着诸葛孔明，顿时众人便有宛若救星下降之感，大喜。此四层三迭，真是荡气回肠的精彩描写！我们看到的是活脱脱的人物形象，重点突出的自然是神机妙算的诸葛亮。赵云、张飞、关羽的勇武，诸葛亮于三迭中突然出现，都闪现着一个指挥若定的战略家——诸葛孔明形象。这里，刘备虽说是“败走汉津口”，但他“败”得有条不紊，行动环节丝丝入扣；字里行间透露出，刘备斜趋汉津并非是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更没有落荒而逃的狼狈之相！而俨然是诸葛孔明早已算计在胸的必然行动，“败”中有“胜”。那三个“必”字的连续，清晰地描摹出了诸葛亮神机妙算的行进轨迹。从而，也在人物形象行为的前屏上显示出，“斜趋汉津”这一战事行动，犹是诸葛亮早在樊城、襄阳时便已谋画而定的战略决策。

按当时的地理形势，当阳之长阪应是古当阳麇城以东（即今湖北荆门市以南）的栎林长阪，为樊城、襄阳至江陵的必经之地。由此地投江陵，平坦少阻。而抄小路斜趋汉津，则越山过洼，困难重重。采取从长阪斜趋汉津的行动，若无成竹在胸的雄才大略，则断断是无法定夺的。对此，与《三国演义》大同小异，以魏为正统的《三国志》和《资治通鉴》，也是绘声绘色地进行了渲染的。以下，将二书的有关著述，作几段摘引：

《三国志》卷三十二《蜀书·先主备》：

十二年……曹公南征（刘）表，会表卒，子琮代立，遣使请降。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闻之，遂将其众去。过襄阳，诸葛亮说先主攻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乃驻马呼琮，琮惧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比到当阳，辎重数千两（辆），日行十余里。别遣关羽乘船百艘，使会江陵。或谓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重点号为引者所加，下同）

曹公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拒之，乃释辎重，轻军到襄阳。闻先主已过，曹公将轻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及于当阳之长阪。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先主斜趋汉津，适与羽船会，得济沔，遇表长子江夏太守琦众万余人，与俱到夏口。先主遣诸葛亮自结于孙权。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

《三国志》卷三十六《蜀书·关羽传》：

（羽）从先主就刘表。表卒，曹公定荆州，先主自樊将南渡江，别遣羽乘船数百艘会江陵。曹公追至当阳长阪，先主斜趋汉津，适与羽船相值，共至夏口。孙权遣兵佐先主拒曹公，曹公引军退归。先主收江南诸郡，乃封拜元勋，以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荆州事。

《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七》“献帝建安十三年”：

初，鲁肃闻刘表卒，言于孙权……到夏口，闻操已向荆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备南走，肃径迎之，与备会于当阳长阪。备用肃计，进住鄂县之樊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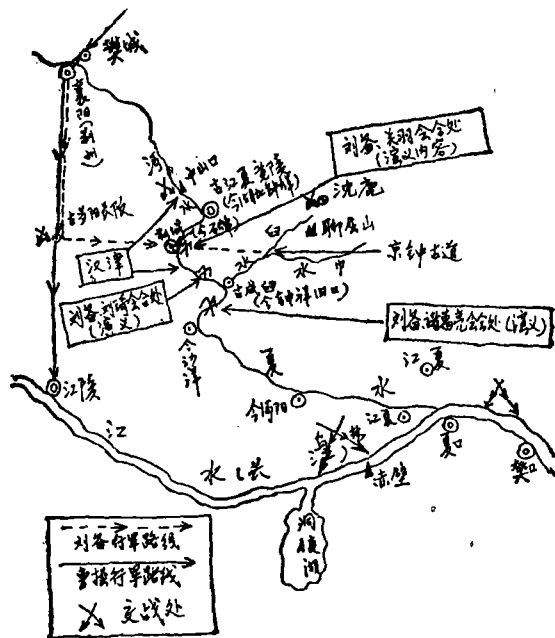
曹操自江陵将顺江东下，诸葛亮谓刘备曰：“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遂与鲁肃俱诣孙权。亮见权于柴桑……亮曰：“豫州虽败于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敝，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

史书的记载与小说的描写，显然在“斜趋汉津”的关键节目上，是大致一样的。小说以形象呈现，史书以史实确证，共同告诉我们：第一，刘备集团斜趋汉津，并非失败之后的仓惶遁逃，而是刘、孙两大军事集团共同协议后的战略转移，鲁肃与刘备、诸葛亮会聚当阳长阪，实际上是召开了一次军事联席会议。也非如《光明日报》1981年3月31日载之《赤壁之战辨》所说的，是所谓“曹操……亲率从大军抽出的骑兵五千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在当阳长阪追上了刘备、诸葛亮等人，一阵冲杀，刘备战败。恰巧这时鲁肃至当阳，他劝说刘备改奔孙吴。刘备当即派诸葛亮随鲁肃往柴桑会见孙权，双方始结联盟”的那种毫无预见性的巧合。第二，刘备集团长阪之战损失的只是百姓、辎重、“被甲者少”的非精锐部队，尽管有“弃妻子”的描述，但毕竟关羽“乘船数百艘”下汉江扎在了汉津，尚有“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可见，刘备集团的军事主力依然存在，不仅不是“已经不堪一击”，而且曹操稍一疏忽，便会遭到沉重打击。第三，刘备之所以现出“新败长阪”之象，只是军事转移时遮掩曹操耳目的一种假象，为的是转移曹操视线，以“军实”引曹操直下江陵，既把包袱丢给曹操，又疲曹于长途之中，从而消耗其有生力量。据史载，果然曹军不久就染上了疾疫，并且在江夏竟陵石城赤壁（即中山口）至沈鹿一带，又被刘备围歼了一支精锐部队。第四，赤壁大战的战场铺得很开，实际上有三大战场：除主战场在长江夏口之西沙羡赤壁之

外，还有黄州赤壁的打援战场和石城赤壁的堵截战场。小说《三国演义》，是把三处赤壁之战合在一处写了。

刘备之所以能够斜趋汉津成功，与汉津所处的地理位置当然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于汉津的确切方位，当依据沔水的位置而定。因为，《三国志》说的是刘备斜趋汉津后“适与羽船会，得济沔”，《三国演义》说的也是“即刻动身，从小路斜投汉津，望沔阳路而走。”沔阳，“阳”者，东南向也。沔阳为沔水之阳，即为沔水东南。既然是“望沔阳路”、“得济沔（水）”，那末汉津必在沔水西北之滨了。关于沔水，三国后不久的南北朝时北周人酈道元，在《水经注》卷二十八《沔水》篇有如下注解：“沔水又东南，与白水合，水出竟陵县东北（应为东南——笔者）聊屈山，一名卢屈山。西流，注于沔。鲁定公四年，吴师入郢，昭王奔随，济于成臼谓是水者也。”成臼，在汉水东岸，为今湖北省钟祥县旧口镇。聊屈山，在今钟祥县东桥镇（古名沈鹿）西南之大口林场境内，系大洪山风景名胜区的的外围风景区，有著名景点云台观。很清楚，沔水即包括汉水流经钟祥的江段，汉津则为汉水流经钟祥的西岸水滨之渡。究其地势，汉津口有山有原有路有口，显然就是在今钟祥县的石碑镇（古荆城、荆台）至马良山一带了。刘备自当阳斜投汉津，关羽于汉津接应刘备，退了曹兵，探明了地势，为三足鼎立奠定了分割地界的态势。古郢石城、江夏竟陵、汉津荆城一带，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当时，这里为曹、刘、孙的三不管地带，但又是三家频频相争的地带。赤壁大战后，关羽坐荆州、管襄阳，也在汉津一带大加营造，战船排列荆城，辐重悉屯汉津，屡与魏、吴争锋。而吴国，则在攻占荆州后于石城置署军管，名石城牙门戍，至西晋，羊祜置为石城戍。当然，这些俱为后话了。

关于刘备斜趋汉津的地理环境和行军路线，如附图所示，一条汉水，斜插长江之腰，将江汉大片土地劈成了两半。汉津一带的地理位置显得十分重要。《三国志》的史载与《三国演义》的描述有一点是不同的。史载曹操过当阳后未及亲追刘备，小说描述却是亲自追击刘备到了汉津。其实，曹操当时不可能立即从小路追击刘备。刘备几十骑，应是十分隐秘地斜趋汉津的。曹操甚至还未来得及探明刘备去向，就直奔江陵了，因为“江陵有军实”。事实上，据《三国志·魏书·文聘传》和《兴都志》中“刘备会战沈鹿”的记载，最先追击刘备到长阪的五千军是文聘和曹纯率领的。曹操



附：刘备集团斜趋汉津地形图

到达江陵接收了刘表“军实”之后，即悟明了汉津的战略重要性，于是又遣文聘、曹纯率军由江夏竟陵过汉江，以绕道包抄刘备，分进合击，从而将长江北岸连营贯成一线。同时，任命文聘为江夏太守。然而，这支人马在石城中山（人称小赤壁）和沈鹿一带，便被刘备军围歼了。

综观战事和地理的诸种因素，刘备斜趋汉津的历史必然性有三：其一，诸葛亮未出隆中，便定了天下三分而后统一的决策，占据竟陵石城、汉津荆城、江夏夏口，是稳定汉水以西直至襄阳、南郡的关键一着，尤其是扼控郢邓荆襄之需的必然；其二，引曹南奔，疲曹于道，

造成曹操据江陵而实为孤立之势，分割江汉，以汉水为宝剑斩断曹操的东西营线，使其合肥蕲黄之兵与江陵彝陵之兵首尾不能相顾，从而形成三个战场，这是刘、孙两大集团联合抗曹得以胜利的共同之需的必然；其三，三分割据，须先占片，如若不能，即联孙迂回逐鹿于江汉，这是刘备集团为求形成鼎足之需的必然。

## 二、“斜趋汉津”在整个赤壁大战中的地位

常林炎同志在《向〈三国演义〉借鉴写战争的艺术经验》一文中写道：《演义》“描写战争并不停留在力的较量上，更突出地表现其智的决胜。……书中凡是描写成功的大小战役，尤其是几次著名的战役，总是把‘人谋’放在第一位来描写。……这一切，并非以离奇的故事或抽象的兵法理论取胜，而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艺术世界出现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则仍然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一般可以作这样的判断，斜趋汉津的行动，是刘备在诸葛亮的谋划指导下于败中取胜的智慧性抉择。从文学角度讲，如前所述，这过程当然写了人物。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从历史的角度，来探讨一下这一过程在整个赤壁大战中的地位。

地位是由意义来决定的。可以说，如果刘备在当阳长阪不斜趋，而径直从当阳南达江陵，那末他必将被曹操杀灭，因为张飞断桥已将全部弱点暴露给曹操了。刘备一旦被杀，别说赤壁大战的刘、孙联合，便是三国鼎足，也呼然而化为乌有了。由此可见，斜趋汉津在赤壁大战中地位之第一条，便是保存了刘备集团的决策层，从而为鼎足三分保存了政治基础。而且，鲁肃会见刘备、诸葛亮，在当阳共同决策而有斜趋汉津，本就说明刘、孙两方已经开始联合了。

中华民族的神话故事，尽管没有流传盗神火造福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可是大禹治水却历数几千年而几乎使妇孺皆知，于是便有时被认为：西方是“火”的文化，东方是“水”的文化。水因大禹而治。大禹治水后，中国的“河、水、沟、渠”，于是就闪动着劳动人民改天换地的智慧与勇武同山川河流合而为一的身影。

《史记·河渠书》中载：

自是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

其后人有上书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张汤。汤问其事，因言：“抵蜀从故道，故道多阪，回远。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从南阳上沔如褒，褒之绝水至斜，间百余里，以车转，从斜下下渭。如此汉中之谷可致，山东从沔无限，便于砥柱之漕。……”

以上引文，说的虽然是漕运谷粮之事，但从中可以看出，秦汉以来，汉沔一带的确是丰饶之域、富庶之乡。对于一个集团、一次战争来说，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当时孙、刘、曹之所以频争江夏、荆州、竟陵和汉津，从根本上讲还是在争经济繁荣之地，以从而立疆建国。刘备斜趋汉津，占据了这一带地方，为赤壁大战的展开和孙刘的取胜，是一个重要的经济补充。

惊天动地的长阪之战，锻造了赵子龙、张翼德这样的壮哉英雄，却也可怜刘备只有“数十骑”相随，“先主弃妻子，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对这一局面，诸葛亮似乎早有所料，也早有安排，先已遣关羽入汉水，后又调动刘表长子刘琦所率的江夏众万余人，尽起夏口之兵，一环一环，有条不紊。其实，这些兵马俱属刘备、诸葛亮统管了。这时的刘豫州，已不再是“败走汉津口”的刘豫州，而是重拥兵威的刘豫州了。接着，“先主遣诸葛亮自结于孙权，权遣

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号称拥83万人马下江南的曹操，惨败逃回许都去也。自此，刘备据荆州，而后进西川，诸葛亮的隆中决策完全付诸实现。在军事力量上，刘备在斜趋汉津之前，数经折腾，几沉几浮，浮时握兵十数万，沉时险遭毁灭。然而从斜趋汉津之后，刘备就一直处于上升状态，军事力量日渐强大，直至鼎足之分正式形成，尔后又欲图中原。因而可以说，刘备斜趋汉津，更是三方军事力量重新调整，从而达到新的平衡的关键之举；是刘备重新崛起的分界点。江汉与洞湘，刘备与孙权，互成犄角之势，相呼相应，主战场与分战场紧密配合，才取得了赤壁大战的整体胜利。

保存政治基础、重要的经济补充、形成军力平衡这三位要素，全方位地构成了刘备斜趋汉津这一军事转移行动在整个赤壁大战中的地位——没有斜趋汉津，就不会有赤壁大战的三方交兵。无疑，这一行动具有不容忽视的战略意义。

### 三、“斜趋汉津”对鼎足三分局势的影响

中国封建社会以自己独特的形象在世界历史上划出了自己的地位和存在的区间，东汉末年至“三国”时代，又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河中以自己独特的规律存在和前进的。连年的频繁争战，不仅带来了政治上的不安定，而且更重要的是破坏了生产力的结构，经济建设处于放任自流和任其崩溃的状态。从这里出发进行考察，赤壁大战以刘备和孙权的联合取胜，从而形成三分鼎足的局面，乃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到当时阶段的必然结果。诸葛亮不只是一个军事家，也不只是一个政治家，他还是一个卓越的经济专家。确切地说，他是一个经济、政治、军事等兼而博通的决策家。他未出茅庐的隆中对，不是小说家的虚构，而是史载之实有。诸葛亮之所以有此为历史实践证明的预言家天才，乃是他研究了当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当然他并没能提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概念名词），并且在此矛盾基础上能够运筹、决策出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形式——只能天下三分鼎足（为大一统过渡）的形式结果。对这个天下三分的决策效应，我们可以称之为“诸葛亮效应”，也可以说是诸葛亮现象。在世界历史上，这样一种预言家的效应，这样一种能为后来的历史实践证实为正确的预言现象，不仅只有诸葛亮的隆中决策。且不说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历史行进规律的总结和概括，能与诸葛氏相提并论者，还有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英国哲学家培根等等。在东汉末年至“三国”纷争时代，诸葛亮提出了“天下三分”的预言，但他也只能提出“天下三分”的预言。同样，这也是由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所决定的。对于这种现象的产生和存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作了精辟的论述：

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消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东汉末年至“三国”时代，就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体系而言，并不是一个变革时代。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区间中的历代王朝交替、诸般世纪更迭，却总伴随着某种意义的变革。这种变革，在中华民族的语汇中，称之为“革故鼎新”。在赤壁大战之后，随着鼎足三分局面的

形成，中国社会进入了相对稳定的繁荣时期，社会经济也进入了相对稳定的繁荣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当然是社会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一时期的到来，最明显的分界线，应当说是赤壁大战。刘备、诸葛亮斜趋汉津而产生的军事力量重新平衡的局面，赤壁大战的孙、刘获胜，以及后来的经营建设，都的确对三足鼎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这里，应当重点强调的是赤壁大战后荆州地域的建设。就《三国演义》的描写和《三国志》的史载，赤壁大战后周瑜病逝，刘备、诸葛亮进入了西川，荆州、襄阳一带便由关羽督帅了。关羽在荆襄、江夏、石城、荆城一带，屯兵垦种，筑城建栅，积辐重于汉津，列战船于荆城，艰难辛苦，颇有营造。其阵营置措，南连江陵，北通襄樊，后与魏将乐进、文聘拒战青泥山（即今钟祥郢中镇之龙山），再后大战樊城获大胜，斩庞德、擒于禁，水淹七军，擒曹仁，颇解了刘备进兵西川的后顾之忧，以致其有“威震华夏”的赫赫声名。此中关节，在《三国志·蜀书·先主备》和《三国志·魏书·文聘传》中也都有载述：

（十七年）曹公征孙权，权呼先主自救。先主遣使告璋曰：“曹公征吴，吴忧危急……又乐进在青泥与关羽相拒，今不往救羽，进必大克……”

文聘字仲业，南阳宛人也，为刘表大将，使御北方……太祖济汉，授聘兵，使与曹纯追讨刘备于长阪。太祖先定荆州，江夏与吴接，民心不安，乃以聘为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边事，赐爵关内侯。与乐进讨关羽于寻口，有功，进封延寿亭侯，加讨逆将军。又攻羽辐重于汉津，烧其船于荆城。

史书的记载，既说明关羽坐统荆襄的艰难，也显示了江汉一带在三国鼎足中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可是殊不知，赤壁大战的胜利，三国鼎立的形成，都有一个刘豫州“斜趋汉津”作为中介！无须细细剖析，刘备长阪之战后的斜趋汉津，对后来鼎足三分的影响，至少也有三个方面：

第一，至汉津，得地利，据汉水，调农水，于是奠定了入川的经济基础。

第二，据汉津，控荆襄，以此为周旋，在曹操与孙权中间插了一支楔子，打下了鼎足三分的政治基础。

第三，别遣关羽入汉，而后又委关羽督汉，前后相应，以飞地权作领地，确保了三国鼎足的格局。象赤壁大战以汉水划割三个战场一样，江汉一带也是鼎足三分的中割区，即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地域基础。

综上所述，刘备斜趋汉津与赤壁大战和后来的鼎足三分，是相辅相成的三个区间。斜趋汉津的军事格局的重新调整，是赤壁大战孙、刘获胜的关键，赤壁大战又是鼎足三分格局形成的关键。没有斜趋汉津，就没有赤壁大战，也不会有鼎足三分的天下相对稳定。可以说，刘备集团斜趋汉津的军事行动，不仅对于赤壁大战，而且对于鼎足三分，都是一个转折点。还须明确的是，从斜趋汉津之后，刘备集团再没有出现军事上的大起大落现象了。